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108356

10位ISBN编号：7208108358

出版时间：2012-8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王立诚

页数：350

字数：32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内容概要

《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》由王立诚编著。

改革开放后，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，我国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逐渐突破早先的侵略与反侵略模式，更为理性地看待外来事物，也更注重对中国文明自身的反省。

在“现代化”与“全球化”两大交织的宏观理论架构下，人们在坚持“民族本位”的同时，努力克服其中的自卑与虚骄，更为高屋建瓴地考察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，也更客观、审慎地分析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各种观念、制度和事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，促进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。

《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》可以被视为这些年来这种历史评价体系与研究方法变迁的实际写照。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作者简介

王立诚，男，1953年6月生于上海，籍贯浙江海盐。

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，英国牛津大学（University of Oxford）圣安东尼学院（St.,Antony's College）博士后，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。

曾出版专著《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》（甘肃人民出版1991年）、《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：沪江大学的历史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）；编校《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》（三联书店1998年）；译著《沪江大学》（珠海出版社2005年）等。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书籍目录

前言

外交篇

鸦片战争前夕的禁烟决策评析

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“法治”的建立

蒲安臣使团与中国近代使节制度的发端

外交家的诞生：顾钧与近代中国外交官文化的变迁

“一·二八”事变与英国对中日冲突的立场转变

外侨篇

上海近代外侨史纲

19世纪上海的西人帮会

观念篇

洪秀全的天命论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构

中西学的整合：孙中山辛亥革命前思想辨析

19世纪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新旧过渡

教育篇

中国近代工商业社会形成中的美国在华教会高等教育

沪江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——20世纪浸会华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变迁

20世纪欧美人在中韩两国办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

建国初期上海高等院校系调整研究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章节摘录

洋务派有志遣使出洋，主要是基于对其实用价值的认识。

总署大臣在办外交的过程中，发现遣使出洋至少有两点益处：一是了解各国的政俗人情，以减少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盲目性，即“探其利弊，以期稍识端倪，借资筹计”；二是在外交上化被动为主动，通过开辟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的途径，“遇有该使倔强任性，不合情理之事”，便可“向其本国一加诘责，默为转移”。

因此，他们把遣使出洋作为办好外交所必须进行的一项改革。

1866年，他们作为遣使的试探，曾派总税务司署的文案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。

然而，在正式遣使的问题上，他们却遇到整个社会的阻力。

虽然在1866年令各省督抚筹议赫德、威妥玛“二论”的上谕中写道：“至所论外交各情，如中国遣使分驻各国，亦系应办之事。

”表明清廷对于遣使之举已基本首肯，但是，当时的许多官员，对此仍充满疑虑。

他们有的认为这会“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，令得挟以为质”；有的甚至担心，“我如派官前往，彼必如论略所云，东西各国代国大臣前来住京，每得入朝秉政之说，而与我使臣以秉政之虚名，即藉口要挟，以求秉中国之大政”。

这些担忧尽管均属臆测，但却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心理，表明在风气未开的当时，遣使之举是不受人赞赏的。

中英修约将临，对于清政府固然是一大危机，但同时也是它统一内部意见的一次机会，使它的一些改革措施在贯彻时遇到较少的阻力。

遣使出洋就是其中之一。

总理衙门早在9、10月间就与赫德在商讨出使的问题，它致各省督抚关于修约的《条说》，则把遣使列入其中，认为它“亦关紧要，未可视为缓图”。

不过，尽管总理衙门已表示了决心，但实际操办起来，却仍颇费踌躇。

从表面上看，“使才难觅”是个问题，“若不得其人，贸然前往，或致狎而见侮，转足贻羞域外，误我事机”。

然而更重要的是，中西间的文化隔阂，使得“中外交际，不无为难之处”。

总署大臣也残留着天朝至尊的意识。

那时，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问题一直迁延未决，遣使各国若按西方礼仪行事，难免影响国内在这问题上的谈判地位，使维持至尊之体的最后一道屏障不攻自破。

因此，当他们找到蒲安臣为使时，似乎发现了回避这一矛盾的出路。

这样做，一方面能使他们收遣使出洋的实益，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中外礼仪方面的纠葛。

正是这种如意算盘，使他们认为，“用中国人为使，诚不免为难，用外国人为使，则概不为难。

”由此可见，在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脑的问题上，清政府其实是想维持它那些残存的至尊国体，而不是想以此取媚外国。

如果说清政府此举是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外国人操纵，那就未免低估了这个有两百余 年统治经验的封建专制王朝。

它在派蒲安臣出使的同时，还派了两个中国官员一同出使。

总署章京方溶师是出使章程的起草人。

他在给文祥的信中指出：“溶师章程中恰专重中朝两使。

”即突出两个中国官员的地位，防止蒲安臣大权独揽。

这表现在规定志刚、孙家谷二使与蒲安臣地位平等，“皆一体平行”；二者分别颁给关防，“于印用关防须由志、孙两使主持，不使他人干预，亦防其渐也。

”

.....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编辑推荐

晚清以降，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，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“变局”。在诸如薛福成、郑观应等当时人的眼中，中国已从早先独立演进的“启蒙”、“封建”、“郡县”之天下，一变而为、“中外联属之天下”。

西洋文明冲击、渗透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一切领域，造成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。近代中外关系史可以说渗透于整个中国近代史，而本人总结自己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经验时，也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中所曾涉入的研究范围颇为宽泛。

因此，如今编辑《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》这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个人集时，王立诚将这些论文分类归为外交、外侨、观念和教育四篇，以便较集中地体现这些论文的主旨。

<<近代中外关系史治要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